

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赵剑英 总主编



世界历史理论的 当代构建

叶险明 著

基于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反思，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证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世界历史时间”原理及其意义和“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原理及其意义，勾勒了作为世界历史理论构成部分的民族观和时代观的基本轮廓，对“全球化”及其发展作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并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视阈阐释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赵剑英 总主编

世界历史理论的 当代构建

叶险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 / 叶险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723 - 9

I. ①世… II. ①叶… III. ①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8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548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思路	(1)
------------------------	-----

上篇 挖掘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理论前提	(43)
----------------------------	------

一 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萌生	(43)
二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	(51)
三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终结	(58)

第二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	(76)
----------------------------	------

一 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形成过程	(77)
二 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科学批判	(84)
三 在“科学批判”中的构建	(96)

第三章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逻辑问题	(117)
------------------------------	-------

一 “世界历史”·“社会形态”·“民族和国家”	(117)
二 “世界历史”的发展图式	(129)
三 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	(134)
四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批判	(144)
五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59)

六 “两部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177)
第四章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本质及其复杂性	(207)
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静态本质	(207)
二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态本质	(214)
三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	(222)
第五章 “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37)
一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话语前提	(238)
二 “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发展形态	(244)
三 方法论意义	(251)
第六章 两种世界历史理论的比较	(257)
一 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	(257)
二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269)
三 两种世界历史理论间的区别	(276)

下 篇 开 拓

第七章 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	(289)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	(290)
二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提出	(297)
三 确立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意义	(303)
第八章 “世界历史时间”原理及其意义	(314)
一 “世界历史时间”·“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空间”	(315)
二 “世界历史时间”的一般规定及其特性	(317)
三 历史时间向“世界历史时间”的转变	(322)
四 正确把握和自觉地直接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时间”	(329)

第九章 作为世界历史理论构成部分的民族观	(335)
一 从马克思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谈起	(336)
二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	(351)
三 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东西方民族主义	(367)
四 民族主义与“新国际主义”	(385)
第十章 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原理及其意义	(399)
一 “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399)
二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	(404)
三 世界历史“双重结构”中的当代中国	(418)
第十一章 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理论批判	(428)
一 “全球化”的主体性批判	(428)
二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439)
三 “政治全球化”批判	(443)
四 “文化全球化”批判	(453)
第十二章 作为世界历史理论构成部分的时代观	(468)
一 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构架及其功能	(468)
二 对一些相关流行提法的时代观批判	(478)
三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辨析	(486)
第十三章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	(501)
一 对当代中国哲学状况的批判性反思	(501)
二 “西方中心论”的类型与对“西方中心论”的拒斥	(514)
三 “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与对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剖析	(521)
四 “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性	(526)
五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	(534)
主要中文参考文献	(543)
主要英文参考文献	(549)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思路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是一个跨学科的重大课题，其方法论意义涵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其内容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不过，在笔者的视野中，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系统研究有一个“基准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故“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亦即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丰富和发展的状况，不仅会直接决定我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研究水准，而且也将会对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发展的水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国外学界,20 世纪 60 年代的“依附论”、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全球历史观”和“现代世界体系”论,以及 80 年代末以来相继出现的各类全球化理论和一些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历史理论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但很不系统,其看法也大相径庭。在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的后期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为止,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也凸显出不少薄弱环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在整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应具有的一系列重要环节的认识和构建,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及其意义,“世界历史时间”原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原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民

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理论批判，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等等。笔者以为，不搞清楚这些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堵塞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丰富和发展的路径，而且也会在方法论上阻碍人们对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当然，在学界已涉及的相关研究域中，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①。

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书中分为两大类，即“挖掘”和“开拓”（但重在“开拓”）。所谓“挖掘”是指：对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宝贵遗产，从时代的高度作出新的诠释，全面昭示其所包含的方法论意义和现代精神。这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的基础。所谓“开拓”是指：基于对“遗产”的深度挖掘，从时代的高度构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新的理论环节。^②为此，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侧重阐释“挖掘”方面的内容，下篇侧重阐释“开拓”方面的内容。当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成果在逻辑上和方法上是相互贯通的，不可能截然分开。为了便于学界同人对笔者的这方面研究进行批判，下面对笔者自以为是的主要学术贡献和主要观点，按叙述逻辑加以概括性地介绍。

① 一般说来，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大体上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卢森堡、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中心、世界历史基础、世界历史构成、世界历史个人等范畴的逻辑规定性；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过程和趋势及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要范畴如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交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的世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科学认识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西方各种全球化理论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其规律的指导意义。在本书的部分章节，笔者从新的视角对上述内容所包含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了再探讨。

②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中，恩格斯、卢森堡、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但由于本书结构和阐释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历史追溯，而在于“论”，即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故笔者只能在一些具体的逻辑论证场合中提及到他们的相关重要贡献。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

迄今为止,学界已有的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著述,大都把工业革命、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资本积累的特性和资本的扩张本性、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等,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原因、基础和思想来源来加以反复论证。应当说,这没有错,但却忽略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的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当然也应作如是观,否则,我们就难以全面、正确地理解:工业革命、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资本积累的特性和资本的扩张本性、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的相关理论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基础和思想来源。因此,笔者提出和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问题。

笔者以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与他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科学批判间的关系中。“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进而言之,从前提来看,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逻辑基础;从过程来看,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一条逻辑主线;从结果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完成,是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科学批判逻辑延伸的产物。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工业革命、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资本积累的特性和资本的扩张本性、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和黑

格尔的相关理论，何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原因、基础和思想来源。

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一种创造性转换，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认识范式的一种创造性转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只有搞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与其由以产生的文化环境的关系，即：马克思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科学批判的过程和逻辑（马克思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科学批判的过程和逻辑，也就是马克思超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局限性的过程和逻辑），才能真正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本质、规律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表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以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点，就在于它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赋予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全新的意义。

系统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文化机理的揭示，全面把握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

二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逻辑问题

所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逻辑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间断性”或“非连续性”，但这种“间断性”或“非连续性”，不是方法论方面的“间断性”或“非连续性”，而是具体理论环节发展方面的“间断性”或“非连续性”。当然，“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并非与具体理论环节发展方面的“间断性”和“非间断性”没有关系。基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文化逻辑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学界一直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即：关于“世界历史”的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

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关于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问题,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评价变化的原因问题,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作“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以真正搞清楚:一方面,“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是“具体理论环节发展方面”的“间断性”或“非连续性”与“非间断性”或“连续性”有机统一的内在根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又在“具体理论环节发展方面”的这种辩证法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这里笔者简述对其中几个方面问题的看法。

1. 关于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之间关系的问题

历史发展规律即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发展规律既存在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存在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但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都不等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形态。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用既包括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又包括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历史例子来加以说明。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方法论上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就必然导致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同样也不是可以相互等同的。作为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由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横向的或纵向的)总和构成的,因此,与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它并不直接存在于每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但对系统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则不能这样说。系统本身具有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不可能具有的新的、整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正是由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历史发展规律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它直接标示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虽然它不等同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但却制约和影响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正如系统的发展阶段虽然并不等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阶段，但却制约着它们演变发展的性质及其总方向一样。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与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要正确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在某一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表现形态，就不能不考虑到该民族或国家所处的那个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发展的状况。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长期所存在的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如社会发展形态的“一”和“多”、社会发展的“单线”与“多线”等问题），都会从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各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2.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问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创作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资本论》创作与“人类学笔记”，在材料准备上有很程度上的相通之处，并在方法论和研究目的上有着特定的从属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一生的全部理论研究，都旨在阐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集中体现的《资本论》的创作，是马克思实现这一目的的主体过程。因此，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

究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为了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由来”,私有制社会的暂时性以及它被更高级的公有制社会代替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这种目的性,只有在确定上述《资本论》创作的“主体过程”的基础上才能加以科学的认定。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考察,他的这方面研究的指向是批判地吸取他同时代人类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而这又是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故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而言之,“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狭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和逻辑上紧密相连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资本论》创作与“人类学笔记”间的关系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基础和主线。不过,绝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狭隘的学科性质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不断地批判吸取他同时代各个知识领域的具体成果作为其前提和补充的,是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方法论上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资本论》创作与“历史学笔记”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第六部分)。

3. 关于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体内容。其重要基本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故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卷入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然要受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决定了,被卷入这一世界历史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都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都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历史时代,但这种变革是有其“极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

界历史，有其特定的从量变、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到全局性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据此，笔者以为，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考察，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定峡谷”的设想，是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总体性思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马克思那里，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考察，如果脱离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总体性思考，那么这种考察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在方法论上无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间的联系和区别，撇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及其结构、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把他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误解为他在探索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把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资本积累”一章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限定，曲解为他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影响限定在西欧；把当代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视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而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视为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受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支配，而东方社会则可以摆脱之。实际上，把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定峡谷”的设想，泛化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既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相悖，又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中，东方各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不是由东方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东方国家是分化的，而不是统一的，根本没有一条专供东方各国“行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说明，从方法论上看，用纯粹“地域或地区性”研究代替“世界历史”研究，就必然使人们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上陷入混乱。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不意味着贬低对东西方国家各自特点研究的价值，而是说，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来研究东西方国家各自的特点，这一研究本身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否则将会被扭曲。

4. 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评价变化的过程及其深层原因问题

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初提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双重使命”的思想,有其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这种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对当时英国与印度关系考察中运用的基础。其主要内容大体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而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既然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那其当然成为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英国的“战利品”要好些;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以前西欧社会本身尚没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和条件,马克思寄希望于世界交往中的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变革对西欧社会的积极影响;马克思当时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彻底否定了印度“农村公社”本身的进步性,认为社会的发展只能借助于外力。马克思晚年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作用只有否定意义上的评价,是源于上述这种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其主要内容大体也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工人阶级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包括英国殖民主义在内的殖民主义丧失了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建设性”,此时的英国殖民主义所起的作用只能使农村公社毁灭和社会倒退;随着殖民地人民反对专制统治和外部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发展,其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加之,通过对农村公社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等问题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识到,由于农村公社本身具有的二重性,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趋于进步的方向。可见,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评价的变化,是源于特定的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变化,它并不表明马克思历史观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逻辑的根本改变。

三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

基于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静态本质和动态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

问题。“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两大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间关系的复杂性；二是构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每一大的阶段的若干小的阶段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复杂性；三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每一大的阶段的各个社会层面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构成每一大的阶段的不同小的阶段的各个社会层面间关系的复杂性；四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不同个体和共同体所呈现的多样性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复杂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在方法论上的要求是：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和把握“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决不能将其单一化和公式化。面对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由分散转变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等诸如此类的话语。

明确“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复杂性，为我们对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其一，关于当今世界历史的本质问题。“本质”与“规律”和“趋势”相互规定，属于同一层次上的范畴，虽然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方法论功用。只有把世界历史的本质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全面、正确地揭示一定的世界历史的本质。当代世界历史，其本质仍然是资本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但资本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不是永恒的，其中包含着不断发展着的否定性因素，即构成新的世界历史形态的因素。从经济必然性的角度上看，一旦这种否定性因素和资本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世界历史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即资本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既有给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的一面，又有为其发展造就有利的条件和机遇的一面。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要在实践中正确把握机遇和风险辩证法，从而不失时机地推进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二，关于当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当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最为复杂情形之一是：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既处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中，又处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被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取代的起点上；而当代作为

制度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直接受资本逻辑的控制和支配，其内部又不断生长着新的世界历史的因素。因此，虽然这两种并存的社会制度间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所难免，但从经济必然性上看，处于同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当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与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都在为达到那个“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着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随着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这种态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故而这两者的相似点也将会越来越多。当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和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关系体制上的相互“借鉴”或相互“学习”的主要根据就源于此。所不同的是：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是为这一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觉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形式，而当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则是为这一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发形态的高级形式。世界历史将有一个由“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由“自觉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形式向“自觉形态”的高级形式发展的复杂、曲折和漫长的历程。

四 “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关系的科学阐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构成环节。这一重要构成环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旨趣和最终落脚点。解读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不能仅从康德的“世界公民”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个人”那里追溯其理论来源，也不能仅凭借马克思直接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文字，更主要应是深入解读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具体语境，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话语前提。这种话语前提包括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内容：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施蒂纳纯粹个人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